

書 評

李 福 鐘*

Jeremy Brown and Paul G. Pickowicz, eds.
Dilemmas of Victory: The Early Years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Cambridge, Massachusett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07, xii+462 pages. ISBN-13:
978-0-674-02616-2

美國有關當代中國的研究，累積其超過半個世紀所形成的學術傳統，可說已到了包羅萬象、觸類旁通的地步。不僅在國際間相關領域難有望其項背者，即使對於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內治「國史」之機構及研究者而言，美國「中國學」領域所產生之研究成果，亦相當程度形成挑戰之勢，¹ 成為所有投身此一領域之學術工作者，不得不參考援引的對象。

收稿日期：2008年9月17日，通過刊登日期：2008年10月15日。

* 作者係國立政治大學臺灣史研究所助理教授。

Li Fu-chung is an assistant professor in the Graduate Institute of Taiwan History at National Cheng-chi University.

- 1 有關美國「中國學」的歷史發展概況，以及其與日本、俄羅斯、西歐之中國研究隊伍規模的比較，參考孫越生、陳書梅主編，《美國中國學手冊》（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3增訂版），「出版前言」，頁2-11。而為了對代表著美國當代中國史研究綜合成果的《劍橋中國史》第14、15卷提出回應反擊，中國社會科學院在規劃「九五」研究課題指南時，甚至編列了「評《劍橋中華人民共和國史》」一項，最後由中共中央黨校教授金春明所領導的團隊申請獲准，並出版《評《劍橋中華人民共和國史》》一書。見金春明主編，《評《劍橋中華人民共和國史》》（武漢：湖北人民出版社，2001），「序」，頁2。

然而美國官方及民間既自1950年代以降，投注大量資源於當代中國之研究，其決策導向及因應現實所需之特質，自然多少反映為議題之設定及方法學之採擇。也就是說，為著深入了解「共產黨中國」，美國之中國研究者自有其關心之問題意識，並依之選擇方便實現其研究工作所必需之素材、論證模式，以及思考取向。也因此，美國學術界所形成的當代中國研究傳統，在某種意義上可說是自成體系，除了史料、文獻、田野訪談等基礎面的原素材不得受限於中國之實際條件外，其餘論述部分可說自成一格。也因此，美國對當代中國的詮釋，往往能夠推陳出新，言人所未言，充分展現當今全球中國研究重鎮之一的學術權威。

不過就因為自成體系，長期以來美國之中華人民共和國史研究，自有其偏好與癖性，集中在諸如領導層的政治動態、中蘇關係、中央與地方互動、經濟發展、共黨政權對社會的滲透等議題上，尤其是1958年大躍進之後直到1989年天安門事件為止，一連串中共高層的權力鬥爭，更是吸引了眾多研究者，某些與既有關心層面不相干或不相容的議題與事件，便可能遭到忽視或棄置。以《劍橋中國史》第14卷「革命中國的誕生」為例，²該書處理的是1949年建國到1965年文化大革命爆發前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歷史，全書十一章，除了費正清（John K. Fairbank）所寫的導言外，其他各章分別處理有關高層政治、經濟、思想控制、韓戰、外交路線、大躍進，以及中蘇關係。而《劍橋中國史》第15卷「中國革命中的革命」，³處理的則是文化大革命爆發（1966）至1982年的歷史，各章議題包括：毛澤東思想、文化大革命、中蘇對抗、中美關係、經濟、教育、文藝路線、農村經濟、城市生活、文學、臺灣。表面上看來或許面面俱到，然而實質上則形塑出一套主流的論述框架，絕大多數的研究議題基本上均可納入其中。邏輯上的均衡完整，卻也可能落入自我設限的窠臼，喪失了對系統前提與預設觀點的反省和思考。

2 Roderick MacFarquhar and John K. Fairbank, eds., *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China, vol. 14, The People's Republic, Part I: The Emergence of Revolutionary China, 1949-1965*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7).

3 Roderick MacFarquhar and John K. Fairbank, eds., *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China, vol. 15, The People's Republic, Part II: Revolutions within the Chinese Revolution, 1966-1982*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1).

1992年起至今，中國持續以年均10%上下的成長速度發展經濟，外在環境的改變相對刺激了學術界的思考方向。後鄧小平時代「革命」符號隨著全民拼經濟而日益褪色，甚至「革命」本身也轉化為商品。政治議題逐漸有被經濟、社會、文化取代的趨勢。在這樣的氛圍下，傳統美國有關中國研究的模式會不會隨之轉變？包括議題選擇、論述形式、前提預設等等，是否亦將隨之出現結構性變化？也許目前仍言之過早。不過可以確定的是，時序進入二十一世紀，史學工作者開始重新思考原先歷史書寫的某些前提假設。顯而易見者，例如，「革命」何以成爲二十世紀中國歷史書寫不證自明的前提？革命的特質是斷裂、顛覆，因而從清帝國到中華民國，從北洋政府到國民政府，從國民黨中國到中華人民共和國，每一次轉換意味著變遷與更替。然而爲何是「斷裂」而不是「連續」成爲一個世紀歷史的主題？二十世紀的中國史難道在「革命」的議題下，沒有其他足以代表「連續」的主題？所有這些問號，在在皆對上個世紀的中國歷史，提出是否應該重新理解的存疑。

由Jeremy Brown與Paul G. Pickowicz合編的《勝利的困境：中華人民共和國初年》（*Dilemmas of Victory: The Early Years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一書（以下簡稱「本書」），整體概念上或許即在於提出這樣的質疑——傳統中華人民共和國歷史研究的「革命史觀」，是否需要若干的調整修正？編者二人在本書第一章「導言」中，即明白質疑「革命」是否真如中共官方所一再宣傳的，帶來舖天蓋地的變化，以致於「撥亂反正」，劃分出截然的「新」、「舊」中國？如果1949年的改朝換代並未真如官方所宣傳，帶來全面性的改變，則1949年作爲一道歷史的分水嶺，其含意便不無疑問（頁6）。

本書由十四篇論文構成，所探討的議題均圍繞在1949年至1950年代初所謂的「新民主主義」時期，⁴發生於中華人民共和國境內從政經核心（北京、上海）到國家邊陲（新疆、西藏），以致於家庭、社會、文化、教育等各類層面的若干變化。全書共分四部分，第一部分（二至四章）談「接管城

4 有關1949年至1956年的「新民主主義」時期，可以參考龐松、王東，《滑軌與嬗變——新民主主義社會階段備忘錄》（鄭州：河南人民出版社，1990一版二刷）一書，頁1-28，主要是關於從概念到成形為政策的過程介紹。

市」，三位作者分別為 Frederic Wakeman Jr.、Elizabeth J. Perry 與 Nara Dillon，探討主題分別為中共對上海的整頓、上海工人，以及私人慈善事業的變化。第二部分（五至八章）談「佔領邊疆」，四位作者包括 Jeremy Brown、Chen Jian、Christian A. Hess 與 James Z. Gao，探討主題包括從內戰到抗美援朝的貴州、西藏「解放」、中蘇關係、「和平解放」新疆。第三部分（九至十二章）談思想與文化的改造，四位作者分別為 Perry Link、Sigrid Schmalzer、Paul G. Pickowicz 與 Douglas A. Stiffler，對象則包括相聲表演者、人類學界、電影工作者，以及中國人民大學的創立。第四部分（十三至十五章）則處理跟家族、家庭有關的議題，三位作者分別為 Joseph W. Esherick、Gail Hershatter 與 Sherman Cochran，探討主題包括天津葉姓家族、上海火柴大王劉鴻生家族在 1949 年後的遭遇，以及 1950 年代農村婦女的生育與接生婆故事。

雖然各章作者不同，所處理的議題不盡相關，然而整體來看，卻相當突出一個事實——1949 年之際的中國，其實際的、全面的情況，遠比簡單的新舊政權交替來得複雜許多。儘管國家東半壁大體上均置於中國共產黨強大的軍、政體制控制下，然而西半邊包括新疆、西藏，尤其是貴州，情況仍充滿變數。

此外，對於藉由農民戰爭奪得政權的中國共產黨，城市居民在 1949 年至 1950 年代的最初幾年，事實上仍抱持著欲迎還拒、摸索學習的心情。也因此，對於如何適應，甚至配合新政府的政策，以達到「政治正確」的目標，從資本家、文藝工作者、基層教師，甚至是理論上新國家的頭等公民——工人，大家都還在尋找一條可依循的準繩。本書半數以上的篇幅，均在探討共產黨政權主政之下，各領域的「人民」，包括工人、資本家、相聲演員、人類學家等等，究竟如何適應新的生存環境。例如本書第十章，以中國第一代考古人類學家劉咸的故事，說明知識分子（尤其是受英美學術傳統訓練的留洋知識分子），在中華人民共和國建立之後，所遭遇的馬克斯學派（尤其是恩格斯）生物演化理論的挑戰。劉咸早年留學英國，師事人類學家 Arthur Keith，之後成為中國第一代考古人類學的奠基者。1950 年劉咸出版了一本《由猿猴至人類的發展史》，另一位著名人類學者盧于道於序言中即表白：「在進入新民主主義之後，吾人更必須使用手與腦，致力於創造」。然而該書

出版僅八個月，劉咸便遭到官方《人民日報》的嚴厲批判，指其為唯心主義張目，該書因此被禁。日後劉咸在1958年的反右鬥爭中被打成右派，復旦大學剝奪其開課權利，並將之分派到圖書館工作（頁243-245）。類似的故事在本書中可說俯拾皆是。

第三章探討的是上海工人在共產黨主政之後，如何與新政府進行互動。雖然上海在1930年代以前曾經是中共長期經營的地盤，然而1949年6月之後時空條件已完全不同，上海工人只能「重新」理解共產黨的政策，以及努力學習自己所應扮演的角色。第四章則是企圖藉由慈善事業的變化，一窺上海資本家在共產黨接管之後的處境。此外，第九章敘述北京的相聲演員，第十一章則探討上海「文華影業公司」著名電影演員石揮（曾主演《假鳳虛凰》（1947）、《哀樂中年》（1948））在「新中國」建立之後的際遇。總之，本書試圖透過不同的中、下階級群眾，展現1949年到1953年之間中國多個地區，主要是城市居民的歷史經驗，據以拼湊1950年代初期「新民主主義」時期中國的混雜面貌。

這樣的論述方式自然有其用意。美國傳統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史研究，「革命」主題一向扮演引導性的思維。幾乎所有促成共產革命得以成功的因素，例如農民運動、延安模式；或是革命之後的持續革命，包括建國後各式各樣的階級鬥爭與社會改造，甚至及於權力高層的路線鬥爭，都是革命論述下的熱門議題。在這樣的研究框架裡，建國初期的「新民主主義」階段，向來被視為過渡性質，不必然具有關鍵性的影響力。於是1949年的革命成功，接續而來的便是社會主義建設、大躍進、文化大革命，多數的研究論旨，都在於突顯「革命」主題之一貫性。

然而正如本書兩位主編在導言中指出，在後毛澤東時代改革開放的影響下，中國的某些發展趨勢竟與1950年代初期有著驚人的相似性。農村人口大批湧入城市，私人工廠與大型國營企業並存，非政府機構與宗教團體獨立於黨組織之外，資本家與其他非黨政人物支持中共政府並參與決策（頁1-2）。也就是說，在相隔約半個世紀的兩個不同時空條件下，竟然存在著社會面貌與政府政策的近似性。於是長期以來以「革命」為核心的思考方式，不再是唯一具有主導能力的議題，在革命之外，另一種長期的、結構性的趨勢或許應該予以重新評價。新的詮釋邏輯浮現，於是歷史重要性的主從次序，似

乎亦顛倒了過來，「革命」或許只是過渡，而另一種「非革命」的歷史命題則隱然成形。Jeremy Brown與Paul Pickowicz進一步強調，由中國共產黨在1950年代初期的若干表現來看，其與1930、1940年代的國民政府竟有著政策上的類似性（頁6）。類此的歷史對比，無疑挑戰了既有的當代中國史論述模式，試圖從遙遠的十九世紀末、二十世紀初，尋找得以與新世紀連繫起來的歷史主題。

在此一脈絡下，另一個長期以來被主流論述奉為圭臬的歷史事件亦同樣面臨挑戰，那就是1949年所扮演的分水嶺地位。1949年作為一個巨大的「革命」符號，半個多世紀以來，持續被視為劃分當代中國史的分水嶺。然而一旦革命褪色，這個看似無可撼動的紀念碑，似乎亦開始搖搖欲墜。兩位編者在本書導言中，即開宗明義宣稱1949年似乎不該再作為一分為二的地界（頁6）。

此一對於主流歷史觀念的挑戰，其實並非本書率先提出。曾以《在中國發現歷史》（*Discovering History in China*）⁵一書知名的近代中國史學家Paul A. Cohen，多年前即已提出對1949年作為近代中國歷史分水嶺的強烈質疑。他在1988年曾發表一篇題為〈歷史視野下的後毛澤東時代改革〉（“The Post-Mao Reforms in Historical Perspective”），目的之一便在於「打破1949年這道障礙」。⁶經過將近二十年醞釀，《勝利的困境》一書再次試圖跨越1949年藩籬，其中自有其現實環境與思想的脈絡存在。正如Paul A. Cohen面對毛澤東去世後的改革運動，確認其已成不可逆轉之勢時，認為1949年的觀念分野必須去除。進入二十一世紀之後，中國持續經濟高速發展，社會主義制度看似一去不復返，政治意識形態已成明日黃花，本書編者再次提出修正1949年歷史分界線的主張，如此方有可能更彈性地處理二十世紀的中國歷史，將之視為一「連續」的社會、經濟、文化，甚至政治的演變過程，而不再有「新」、「舊」中國之分。本書運用極大篇幅描繪1949年至

5 Paul A. Cohen, *Discovering History in China: American Historical Writing on the Recent Chinese Past*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84).

6 Paul A. Cohen, “Reflections on a Watershed Date: The 1949 Divide in Chinese History,” in Jeffrey N. Wasserstrom, ed., *Twentieth Century China: New Approaches* (New York: Routledge, 2003), p. 29.

1953年間發生在中國各地、各階層的大量平凡事蹟，目的即在說明此點。

本書的這兩項嘗試——顛覆「革命史觀」與跨越1949年分水嶺，可說是頗有創意的見解。只不過「革命史觀」真的落伍過時了嗎？事實上，「革命」主題之所以重要，原因出在1911年以降長達半個多世紀的中國政治、經濟、社會、文化發展，幾乎都擺脫不掉「革命」的強烈意志。孫中山說革命是「先有一種建設的計畫，然後去做破壞的事業」，毛澤東則認為「革命不是請客吃飯」，「革命是暴動，是一個階級推翻一個階級的暴烈的行動」。不管怎麼說，革命都迴避不了破壞的行為。而證諸1911年之後一個甲子的中國歷史經驗，革命的破壞事業由起初的執行者軍閥與政黨，最終落實到每一個人皆可以對身邊的階級敵人進行革命專政。革命在二十世紀的中國歷史上所佔的地位，果真只是過渡，而非結構性因素嗎？

1989年天安門事件之後，由鄧小平拍板決定「不搞爭議」、「發展才是硬道理」的政治路線，中國政府對內維持穩定，全力發展經濟，至今已近二十年。然而看似明日黃花的革命記憶，是否已從此不再成為中國社會的主導力量？筆者對此不免有所保留。1949年中國共產黨因軍事勝利建立政權，其時空環境與當今中國社會因迫切期待富裕生活而持續容忍政治上的黨國威權統治，之間存在本質上的差異。如何從歷史角度界定當今中國所處的「後革命時代」，似乎不應簡單將「新民主主義」之歷史經驗作隨意比附。

此外，本書之所以主張1949年的關鍵地位值得檢討，主因在於1949年至1950年代初期所謂的「新民主主義」時期，一般人民生活與社會狀況並未與1949年以前有明顯差別，這正是本書十四位作者試圖藉由各篇論文合作拼湊出的歷史形貌。然而正如前文曾經指出，本書涉及的故事主角大多居住城市地區（工人、資本家、演員、教師），取樣的分布範圍極為有限，對於農村的土改經驗，本書並未進行專章討論。1949年之後短暫的「維持現狀」(status quo)，亦不表示這種「邁向社會主義前的過渡階段」會持續長久。某些過度重視「新民主主義經驗」的歷史論述，可能都犯了太相信中共領導人（尤其是毛澤東）承諾的錯誤。⁷ 如果新民主主義注定只是曇花一

7 關於此點，筆者曾作過部分論證，見李福鐘，〈中國共產黨為什麼放棄新民主主義？〉，《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40(2003.6): 189-240。只不過全面性的檢討，仍有待針對更多文獻，作進一步的討論。

現，那麼1949年無疑即代表著社會主義改造已箭在弦上。1949年的重要性絕不僅僅只是一場內戰的落幕而已，同時也是中國社會翻天覆地的起點。

總而言之，本書對於重新發現史實，披露1949年之後數年間中國社會個別階層的部分人士的生活情狀，有其新意。但以如此短歇的階段，尤其是處在兩段大型政治風暴夾縫中的特殊時期，是否能夠作進一步延伸，將之與二十世紀的其他時期進行連結比較，並進而得出長期的歷史推論，筆者仍然存疑。